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公园城市的文化保护策略研究 ——以重庆市大足区为例

Research on Cultural Protection Strategies of Park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Taking Dazu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the
Example

王 正^{1*} 龚楚杰¹ 杨大东²
WANG Zheng^{1*} GONG Chujie¹ YANG Dadong²

(1.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045; 2.重庆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重庆 400045)

(1.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MountainTown Construction and New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China, 400045; 2. Dazu District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Chongqing, China, 400045)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2)09-0098-08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2. 09. 0098. 013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2-04-19
修回日期: 2022-07-20

摘 要

自然生态安全与文化特色彰显, 是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追求的价值体现。公园城市规划突出生态价值与人文关怀, 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引入有助于对公园城市文化资源及其文化生态环境的动态保护。以公园城市文化动态保护为核心问题, 提出文化生态学在公园城市文化保护中的适用性应用。分析城市文化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的作用机制, 形成文化丛、文化簇等要素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依据文化资源与景观空间的作用联系与影响机制, 总结区域、城镇、社区层面的城市文化动态保护策略: 文化生态系统构建、文化生态系统协调、文化活动社会开展。最后以重庆市大足区为例, 基于文化生态系统的要素识别与文化物种的生态演绎历程实现对大足石刻文化、五金文化、海棠香国文化等主要文化物种的动态保护, 实现“以文化人、以文兴城、以文生境”的城市发展目标。

关键词

文化生态学; 公园城市; 文化物种; 文化生态系统; 文化丛与文化簇; 大足区

Abstract

Natural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mbody the value pursued by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Park City planning highlights the ecological value and humanistic care, and introducing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theory is conducive to the dynamic protection of Park City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dynamic cultural protection of Park City as the core issue, and it puts forward the applicability of cultural ecology in the cultural protection of Park cities; Analyzes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urban cultural species and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forms a cultural ecosystem composed of cultural clusters, cultural clusters, and other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al connec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between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andscape spac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ynamic protection strategies of urban culture at the regional, urban and community level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cosystem, the coordination of cultural ecosystem,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ctivities. Finally, it takes the Dazu District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and is based on identifying elements of the cultural ecosystem and the ecological deduc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species. As a result, we can realize the dynamic protection of major cultural species such as Dazu stone carving culture, hardware culture, and Haitang Xiangguo culture, and achieve the urban development goal of “cultural peopl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ity, and cultural habitat”.

Keywords

cultural ecology; Park City; cultural species; cultural ecosystem; cultural clusters and cultural clusters; Dazu District

王 正

1972年生/男/安徽安庆人/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注册规划师/研究方向为生态城市设计、城市历史文化与保护

龚楚杰

1994年生/男/湖北荆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保护

杨大东

1986年生/男/重庆人/注册城乡规划师/院长/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wz0594@sina.com

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城市新区规划设计优化技术”(编号: 2018YFC0704601)

随着社会发展与物质丰盈，民族地域文化逐渐成为国家、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历经40年快速城镇化，中国城市出现历史文化遗产权建设性破坏、文化景观整体性缺失、地域文化特征式微等问题。在倡导生态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城市发展愈加关注对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

公园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模式的实践探索，关注自然资源保护与以人为本，通过将城市建在公园里实现“生态、生活、生产”的“三生合一”城市发展目标。在文化保护中，历史保护学的理论注重文化遗产本体的静态保护，忽视城市文化在时空维度下的动态演进。因此在公园城市规划中，城市文化的动态保护与活化利用成为亟需思考的关键问题。文章尝试将文化生态学融入公园城市的文化保护策略中，以实现文化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的动态保护，在城乡建设中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突显城市文化特色，彰显城市个性魅力。

1 公园城市规划中的文化保护及魅力提升

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后，城市文化功能成为关注重点，集中体现在城镇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特色彰显^[1-2]。城镇化进程早期，城乡规划与建设中“强”城市物质空间建设及基础设施完善、“弱”城市文化的保护与利用，致使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破坏、城市景观风貌趋同、城市文化辨识度减弱等问题的出现^[3]。因此在存量规划时期需要规划转型，寻求适宜理论与技术方法解决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问题。

公园城市作为中国新时代的城市绿色发展模式，强调将生态价值融入城市建设，在生态文明与以人为本的价值引领下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相融合，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

间以实现“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合的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模式^[4]。因其涵盖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探索合理的城市发展路径^[5]。

1.1 历史文化保护的发展历程

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从历史文化古迹单体向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再到包含多种文化遗产类型的历史城镇、城区及其组成的城市整体；保护原则从原真性扩展到兼顾整体性、独特性与多样性。2021年5月，中国通过《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保护好传统文化基因，鼓励继承创新，彰显城市特色，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强调以大历史观构建对文化系统的整体认识，实现对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并通过合理方式将其融入居民生活中，达到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6]。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不仅在认识层面、空间尺度、管理原则及程序上提出具体要求，更在其中融入时间维度的动态过程，实现历史文化保护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1.2 公园城市中的历史文化保护

公园城市的文化保护延续历史学理论，对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等资源进行甄别梳理，采用分级分类的保护管理机制，包括空间管控核心保护区、控制协调区与风貌保护区，实现对文化遗产及其所处环境的整体保护，继而合理使用。目前公园城市的文化保护与价值体现多基于场景理论，将人作为场景消费主体，依据文化内涵与景观环境的内涵联系与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通过空间手段使其融入公园场景，以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使用^[7-8]。在2020年公布的《公园城市指数（框架体系）》中，对公园城市文化

价值提出明确要求，即需要通过自然空间与人文资源的契合实现文化场景的营造，提升文旅服务质量，为民众及旅客提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的适宜环境，以此营造公园城市的良好文化消费环境，从而实现城市文化魅力的彰显。

1.3 公园城市中文化保护与魅力提升的关键问题

城市魅力来源于城市文化的内容构成^[9]，其文化内容需要空间载体予以表达与呈现^[10]，因而在城市文化魅力提升的过程中容易产生重视空间手段而忽略对文化内容本身的理解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重空间格局，轻人文内涵；重数据解析，轻文化分析；重场景营造，轻文化服务。

（1）重空间格局，轻人文内涵。城市文化的形成源于人类社会群体在自然生态、社会背景等综合环境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积淀^[11]，文化景观则基于这一过程在空间上反映城市文化的具体特征^[12]，文化景观所构成的空间格局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城市文化的结构框架。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顺承城市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是基本规划思路，即延续城市空间肌理，通过文化符号重现强化整体文化景观特征，但也存在因重视空间形式、结构框架以及复刻文化符号，造成隐藏在这一文化特征下的人文内涵缺失，最终形成文化景观徒有其表的城市文化困境。

（2）重数据解析，轻文化分析。处于大数据时代，王云才^[13]基于文化地理学空间技术分析文化景观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并借助文化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就镇域文化空间演变历程进行剖析，提出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管理机制，并使用数据分析增强了文化空间保护的科学性，但文化内涵伴随时空变化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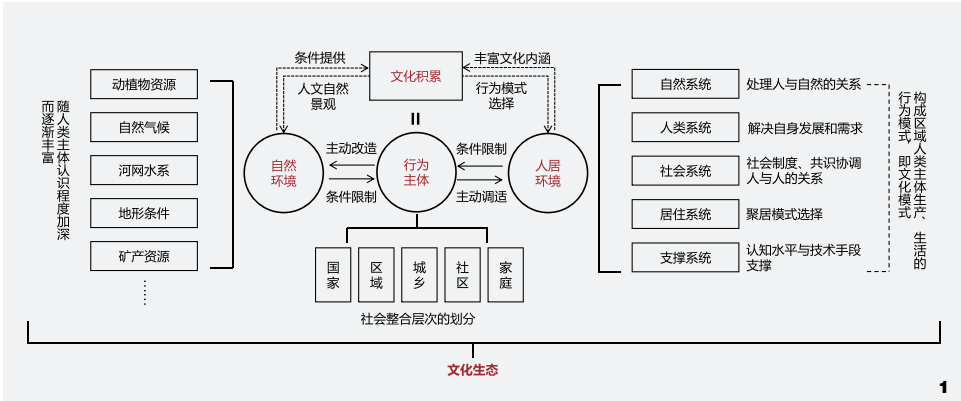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生态的动态体系构成
Fig. 1 Dynamic system composition of cultural ecology

断生长，需要把握文化演替逻辑与文化生态系统内各文化物种间的相互关系，强化其内在生长及存在方式的认知。

(3) 重场景营造，轻文化服务。对城市文化的保护，除对文化物质载体的保护外，更多通过文化场景的营造来烘托城市文化氛围，配合经济运营模式，借助地方文化标签追求经济效益产出。文化体验局限于外在感官而忽视对文化精神享受的服务，部分具有一定文化特色的历史城镇注重保护具有文化景观特色的物质载体，而忽视非物质性文化活动保护，造成文化的服务性缺失，淡化城市文化氛围。

2 文化生态学在公园城市文化保护中的适宜性应用

2.1 文化生态学的动态文化观

文化生态由斯图尔德^[14]提出，认为文化演进是多线开展的动态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调适进而与所处环境形成稳定状态。1980年后，中国学者对其理论展开研究，在理论认识上区分“文化生态”的广义与狭义内涵，广义上作为一种动态文化观认识文化生态系统整体，狭义上以可持续发展视角理

解系统内各要素与文化间的相互关联^[15]，由此实现对文化的整体保护并促进文化的再发展(图1)。文化生态学的动态视角，即基于因果逻辑分析文化现象的演替过程，及其与各空间环境要素的互动作用关系，以使文化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稳定的状态。

2.2 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应用

2.2.1 文化生态学的策略与方法

在文化保护过程中，以整体系统观和动态发展观理解与文化内容相关的系统要素和演变逻辑，保护文化物种演变的遵循逻辑与要素条件。策略形成基于文化内容与空间要素的作用联系，依据文化生态学相关概念进行管控要素识别，完善与优化文化空间要素，补充与改善文化演替机制。理论方法在于把握文化内容与空间环境的互动方式，依托空间手段与管理机制赋予城市空间以人文内涵，通过文化间的作用联系与共存条件形成文化保护整体框架，并基于文化产生的逻辑引导人这一行为主体的实践参与。

2.2.2 文化生态学应用的技术与实践

规划领域内对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应用主

要集中在与类型学、文化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等技术方法的结合。类型学的应用在于以文化生态学概念对文化景观赋予文化物种的概念予以分类并评价，形成对文化保护的指引方向^[16-18]，以文化基因显性呈现与隐性表达，构建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设计框架^[17]。文化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则通过对文化空间的“斑块、基质、廊道”的景观分类，分析文化景观整体的空间格局，后以文化生态学分析这一空间结果，指出对应的文化整体保护策略^[13]。

总体而言，文化生态学在规划领域内的应用，首先通过文化生态环境要素识别与文化演变历程梳理，分析文化物种与所处环境间的作用机制，理解文化景观空间内涵，以此明确文化要素、特色空间形式及文化景观的非物质性要素；其次划分文化层级构建文化生态结构，对文化要素与关联要素整理分类以形成文化保护与旧城更新策略。

2.3 文化生态学于公园城市文化保护的适宜性

2.3.1 文化生态学对公园城市文化保护的启示

在城市文化研究与保护中引入文化生态学，将有助于在划定静态空间保护范围、评价文化空间整体性的基础上融入对文化自身演替的作用机制、所需条件、场景特征等方面的分析，注重对其文化内涵的理解以此保证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改善城市空间中的文化内涵淡化、文化保护过程中的整体性薄弱以及城市文化生活氛围淡化等问题。具体而言文化生态学对公园城市文化保护有以下启示：

(1) 文化生态的动态结构。文化生态的构成要素其本身具有动态性，需分析文化物种在文化生态中与各要素间的功能联系、作

用机制,以选择适当方式对文化采取保护措施。在公园城市文化保护中引入文化生态的概念,有助于以动态视角分析城市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的作用联系,以此构建文化生态结构达到文化保护与特征强化目标,并融入公园体系构建与空间文化氛围营造过程中,形成城市文化生活氛围。

(2) 文化物种的动态活性。文化物种的存在方式需通过物质载体呈现,更需要人的参与予以表达。因而在公园城市文化保护过程中,需对关联文化活动内容、场所条件、表现形式等进行梳理,在文化保护过程中有所侧重,以达到对文化的“活化”利用。

2.3.2 文化生态学引入公园城市文化保护的必要性

在倡导生态文明和文化自信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对文化的保护注重整体性与系统性,并要求以合理方式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因此为实现公园城市文化保护,突显文化功能并继承与传扬地方文化,需以动态文化观与理论方法正确认识城市文化,制定保护策略并引导公众广泛参与到文化活动当中以保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19]。

2.3.3 文化生态学在公园城市文化保护运用的适宜性

文化生态学作为跨学科理论,其较强的工具属性可与相关技术方法结合并用于公园城市的文化保护过程当中。在文化资源梳理中,剖析文化物种构成,解析文化生态系统中文化景观与自然环境、制度环境等环境要素间的互适关系,理解文化内涵以明确文化保护方向^[20];在文化保护中,基于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以及文化与环境要素的作用方式梳理文化基因要素,并以文化丛、文化簇概念划分层级,以此融入城市公园环境,形成

文化保护建议与策略,制定文化资源与景观空间紧密联系的保护框架^[16-18];在城市文化活化利用方面,可基于文化物种的存在条件并结合公园空间开展文化活动,使其融入居民日常生活。

2.4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的公园城市文化保护方法

(1) 文化物种识别,文化生态的系统性分析。文化物种识别基于文化资源梳理并以类型学划分。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并区分文化资源的可见性与潜在性,即是否能直观感受到文化景观、文化行为和文化产品等。对文化资源的梳理则基于现有文献材料整理,通过走访等方式予以补充,以厘清各文化物种的演替逻辑、成长过程及存在条件,从而进行文化生态的系统与结构分析。

(2) 空间耦合分析,景观要素的梳理总结。文化景观是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人类群体面对复杂环境时基于自身价值观念所做出的行为模式选择,并在自然生态空间、人居生活空间等载体上有所呈现与映射^[21]。文化资源与景观环境的空间耦合基于文化演替的逻辑分析,即依据文化生态的演绎历程、文化物种的存在形式和条件分析与相关空间要素的关联性,梳理同属于文化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子类要素,以此作为媒介将文化保护空间纳入自然保护空间之中,实现在自然空间保护的过程中对文化空间进行整体性保护^[22-23]。在区域尺度进行文化内容与空间环境的耦合关系分析,则可基于宏观文化演替视角、传统村落与镇域等尺度的文化空间耦合关系以形成互馈关系,巩固文化保护的整体性与动态性。

(3) 文化氛围营造,文化活动的公众

性参与。文化活动的开展是文化物种活性的动态表现,也是文化演替的必备条件,因而需要动员公众广泛参与到各种文化活动中。同时相关活动的开展受限于空间场所、器具设备、风俗习惯等条件要求,基于满足各类文化活动进行的条件也是对空间策略的补充,并最终在文化活动进行需求与空间场所条件的双向反馈中实现城市文化生活的营造,同时达到文化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目的。

3 重庆大足区文化生态系统构建

大足区位于重庆西部,是成渝相向发展腹地、巴渝文化旅游走廊的重要支撑,古称“海棠香国”,有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代表作——大足石刻,1999年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嘱咐“一定要将大足石刻保护好”。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大足区高水准、大手笔、全域化打造大足石刻文化公园;加大文化植入城市力度,建设国际知名旅游地;争做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城市性质确定为“国际文旅名城、特色产业高地、石刻文化公园城市”。

3.1 大足区的文化生态系统

3.1.1 文化物种与文化生态演绎

大足区总体呈现出石刻文化、五金文化、海棠香国文化、红色文化、重汽文化等5种主要文化物种共存的文化环境。相关文化物种的产生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文化环境等复杂环境要素的综合影响,并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形成能够反映该文化内容的空间景观。对文化物种生态演绎过程的梳理,既是对该文化物种存在条件、作用功能的明确,也可用于分析各类景观要素与文化内容的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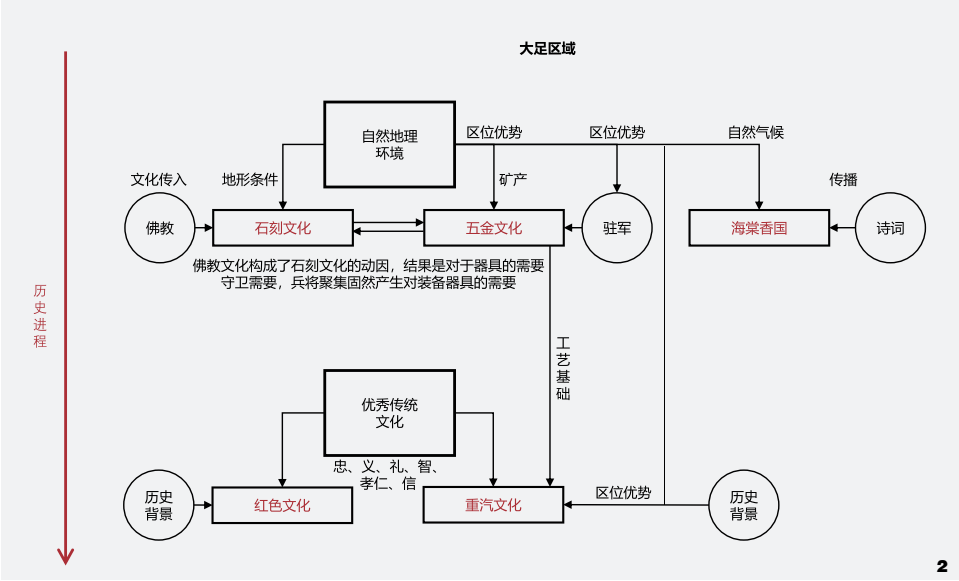


图2 大足主要文化物种的生态演绎
Fig. 2 Ecological deduction of major cultural species in Dazu

间联系(图2)。

(1) 自然环境因素。重庆市大足区具备山地地形条件,整体呈现“六丘三山一分坝”的地势特点。地处两江分水岭,内部水网交错,与山地地形共同构建出大足区基本的山水空间格局,为各种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

石刻文化物种,以山体石壁为基底而进行文化主题创作的文化类型。大足山地地形条件为石刻造像提供适宜空间,内挖形成龛位可减缓自然风化过程,有利于石刻造像的长久保存。五金文化物种的诞生,矿物质含量是其产生基础,大足紧邻玉龙、永川、巴川(今铜梁)等地盛产铁矿,彼此间水路、陆路交通便利,能够为五金文化物种的生长提供保证。海棠香国文化物种,起因于海棠本无味的一般植物性状,但在古昌州因其特殊性被人们铭记而逐渐演化成区域文化特征。

(2) 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构成因素

复杂,在此只进行历史背景与经济技术方面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分析。石刻文化物种生长于唐宋社会经济相对繁荣且佛教兴盛时期,僧人赵智凤的带领则加快了这一文化物种的产生和发展。五金文化物种诞生于唐末黄巢农民军起义期间,驻守昌州节度使韦君靖在大足龙岗山一带组建地方武装,为保障器械自足则直接促使五金文化的诞生。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陪都,大量人口迁聚增加了对五金产品的需求,进而促进五金文化物种的生长。随着工业时代到来,建国后因发展需要、战略隐蔽性等多因素考虑,选择在大足建设重型汽车厂,进而改变了地方生产生活方式并成为城市文化记忆,由此产生重汽文化物种。

(3) 文化环境因素。文化物种是对文化现象的生态学概念划定,源自人与自然、社会等环境的互动过程,并影响其他文化的发展进程。文化环境的提出,在于分析文化物种间的关联,以系统保护文化物种及其共有

的存在条件。如大足五金文化的产生早于石刻文化,既为石刻的兴起提供条件,也再次促进了自身发展。且五金文化的环境基础,也对重汽文化的产生具有一定影响。

3.1.2 大足文化生态系统构建

以文化生态学的类型划分,石刻文化、五金文化等是大足区文化生态系统的主要文化物种,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因人口积聚而产生历史文化名镇、传统村落等文化空间,以及因绿色生态文化理念划定风景名胜区。根据文化生态学内文化丛、文化簇的层级划分,可分为石刻公园文化丛、风景名胜文化丛、五金文化丛、重汽厂区文化丛、红色文化区文化丛、历史文化名镇文化丛、传统村落文化丛、海棠香国文化丛(表1)。

3.2 大足区的文化生态特征

大足区文化生态系统是基于时代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并逐步作用于空间载体之上形成现有文化生态特征与空间格局。通过研究大足各文化物种的生态演绎历程,形成以大足自然山水格局为基础,凝结文化特征的城镇、村落以及被赋予文化内涵的自然风景区等共同构成了区域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基底,并在其系统内不断丰富文化种类,形成当前文化物种多样且丰富的文化生态格局。

(1) 自然山水的空间基底。大足区自然山水格局是各类文化内容产生的基础条件与影响因素,城镇村落等凝聚文化特征的空间区域选址基于空间生态资源的引导,总体而言大足城镇村落的选址基于“背山面水”的原则,并在其所处区域及周边自然空间依托现有资源进行相关文化实践活动。因此对于区域山水格局的保育也就是对文化生态环境

表1 大足区文化层级划分
Tab. 1 Cultural hierarchy of Dazu District

文化丛属性 Cultural cluster attribute	文化丛名称 Name of cultural cluster	文化簇构成 Composition of cultural clusters		备注 Remarks
		物质性 Materiality	非物质性 Immateriality	
历史传统文化	石刻公园文化丛	石刻造像、壁画、寺庙、塔、建筑风貌、色彩色调、空间组合形式、地形地貌、周边自然环境	祈愿活动、布道活动、宗教价值观、民俗故事等	与风景名胜区文化丛存在叠加；石刻文化与五金文化存在联系
	五金文化丛	五金博物馆、展览馆、交易市场、厂房作坊、主题公园	锻造工艺、行会商会、民俗活动、民俗故事	石刻文化与五金文化存在联系
	历史文化名镇文化丛	建筑风貌、建筑形式、街巷尺度、空间构成、色彩色调、地形地貌、周边自然环境	风俗习惯、传统手工艺、修筑工艺	与风景名胜区文化丛存在叠加；部分与传统村落文化距离较近
	传统村落文化丛	建筑风貌、建筑形式、街巷尺度、空间组合方式、色彩色调、地形地貌、周边自然环境	风俗习惯、传统手工艺、修筑工艺	与风景名胜区文化丛存在叠加；部分与历史文化名镇文化丛距离较近
近现代文化	红色文化丛	纪念馆、展览馆、陵园、名人故居	历史故事、人物传记	
	重汽文化丛	博物馆、工业遗产、主题公园	历史故事、人物传记、精神内涵	
自然属性	风景名胜区文化丛	山水格局、地形地貌、动植物种类	被赋予的文化内涵	与石刻公园文化丛、历史文化名镇文化丛、传统村落文化丛存在叠加
	海棠香国文化丛	海棠、花卉展览	被赋予的文化内涵	可与其他文化丛进行叠加

的整体保护，而为延续文化发展需结合文化生态演绎的历程对相关自然空间要素进行管控，使其景观空间能够与文化内容相契合，进而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2) 文化属性的空间斑块。文化属性的空间斑块可理解为具有同质性与均质性的文化丛空间范围，是能够反映文化类型特征的物质空间。就大足区域尺度而言，历史名镇、传统村落等人居空间可视为一种文化空间斑块，能够在空间范围内通过建筑形式、体量色彩等物质方面以及人们的生活模式、风俗习惯等非物质方面映射文化的空间特点。五金文化丛、重汽文化丛等可视为位于城市空间斑块中具有特色文化属性的空间斑块。石刻文化丛、风景名胜文化丛可视为经人的文化活动实践所产生的文化空间斑块。

(3) 生态联系的空间廊道。自然生态的

系统功能发挥需要廊道空间予以支撑，其稳定的功能状态是文化发展的必备要素。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是其自身演替的重要过程，需要线形的空间予以承担。在大足区域文化生态格局的分析中，其能够维持自然生态功能稳定的线形空间包括河流廊道、植被廊道以及动物迁徙廊道；能够起到促进文化传播交流的廊道则包括历史文化步道——小川东道，以及联系各空间区域的交通廊道。通过廊道的线形空间能够起到区分景观基质并连接各文化空间斑块，以此起到连接与协调的功能作用。因此对于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需要协调各类型廊道的生态功能以维持系统的整体与稳定。

4 大足公园城市的文化保护策略

4.1 区域文化保护的规划策略

(1) 文化生态：文化资源梳理与文化空

间斑块明确。文化资源梳理并制定整体保护策略，可从4个方面进行：梳理文化产生时间、整理文化所含内容、分析文化间的关联、厘清文化丛与文化簇内容构成。可参考文化物种的生态演绎过程，通过其生长历程总结影响文化物种产生、联系及演替的关联机制，明确各文化物种的存在条件。其次以文化生态学文化丛、文化簇的概念对大足文化资源进行梳理，以此明确区域各类型文化空间斑块的分布，包括其衍生出的文化内容、文化产生所需条件、文化物种所在空间特征等，从而达到文化的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以此作为引导城镇文化保护的依据。

(2) 自然生态：自然本底维护与文化生态功能协调。文化景观的完整依托于自然生态空间，需以自然廊道维系其自然生态功能以保证各景观要素的完整，并为人们开展各项文化活动提供支撑。廊道网络的搭建在

公园城市规划中指使用空间措施有效连接各类型公园及绿色空间，以自然廊道维系其生态平衡，以交通廊道为人们提供前往公园开展活动的便捷路径，这也是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基础。文化发展的持续基于人在各文化斑块间的空间位移，需要交通廊道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并串联各文化斑块以形成文化生态整体。文化生态廊道网络的搭建应避免因交通网络的搭建而造成对重要自然生态廊道的分割。

(3) 物种融入：文化物种融入与文化生态环境协调。公园城市中公园体系构建，目的在于维护自然生态的基本功能，并为人们提供优质人居环境；文化物种识别与文化层级体系划分，目的在于对历史传统文化的保护，并协调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以维持整体文化环境的平衡稳定。将文化物种融入至适宜的生态环境之中，需满足文化物种在生态演绎过程中与自然空间产生的关联条件。通过对公园体系与文化丛分布的空间结构进行梳理，并基于文化生态演绎过程对景观要素进行管控并依据文化丛、文化簇的要素构成以完成整体环境的协调。

4.2 城镇文化保护的规划策略

(1) 文化结构：文化生态系统内的镇域文化结构完善与整体保护。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梳理，是认知城市发展历史，理解地方民风习俗的关键措施。同时，文化发展过程也能够为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上的指引。大足已形成以石刻文化为代表，五金文化、海棠香国文化等5种主要文化类型共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但这5种主要文化在大足区内各个镇域以及街道的具体呈现中存在差异和不同。因此在城镇层面应以区域文化结构为基础，根据各城镇内的具体文化表现进行文化

结构的再次补充，并以文化丛、文化簇的分类方式对文化要素进行保护，具体可按照镇域文化资源再挖掘、镇域文化生态分析展开。

(2) 公园结构：生态安全格局引导下的空间管控与公园体系构建。在大足城镇层级为巩固与提升区域自然生态安全格局及生态功能，为之提供高质量的绿色生态产品，可从生态空间管控与镇域公园体系搭建两方面予以完善与补充。即基于区域公园体系的引导，在城镇空间尺度依据内部所具有的自然风景区、生态敏感区、公园文化区予以空间管控，整合区内零散自然绿地空间，根据地方自然生态空间与城市内部绿色空间分布构建城镇公园体系，按照15 min生活圈理念划分郊野公园、主题公园、社会公园、小尺度游园等，后依据文化丛、文化簇的空间分布予以公园文化主题的再次明确，进而植入与之相关的配套功能服务，以满足绿色生态产品供给与文化精神服务的要求。

(3) 物种共生：多元文化物种的协调共生与生态空间环境的优化。多元文化物种的协调共生则可根据文化生态内各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引导，以城镇文化生态结构的补全为依据，通过机制条件的调适以保障多元文化物种的演替，基于该文化丛、文化簇的构成要素进行文化物种存在空间环境的完善与优化，为文化物种的演替提供适宜环境。在对具有一定破损的文化丛进行文化簇要素完善时，应尊重该文化物种的演替逻辑与文化生态特征，以延续文化景观内容与所在空间环境的联系性，并注意文化景观与地形地貌条件的结合，遵循基于内在文化逻辑的空间构成方式。

4.3 社区文化保护的规划策略

(1) 文化要素：民俗文化内容继承与

组建文化活动机制。民俗文化内容的学习与传承，是实现历史传统文化保护的保障，也是形成良好文化环境氛围的动力之一。文化内容的学习与传承，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大足剪纸、石雕、竹雕及泥塑等传统手工艺。对文化内容的学习传承可分为三种模式：传统师承模式、政府鼓励推动、自身主动继承，通过三种方式的协同努力以实现文化内容的继承。文化活动开展的长效机制是形成良好文化环境氛围的必要条件，以此能保证相关文化活动内容得持久维系。维系文化活动最有效的方式，即是让其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2) 公园布置：社区公园体系构建与公园空间平衡分布。社区公园体系构建，基于城镇公园结构再次细化并结合其文化主题予以社区范围内的针对融入，以在社区层面建立“社区公园—主题游园—口袋公园”的公园体系，满足居民的个性化服务需求。社区公园平衡分布一方面在于满足居民对公共活动空间与绿色空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为居民提供紧急避险的室外开敞空间。同时作为中小尺度的社区级公园更应秉持10 min生活理念，以实现便民利民的综合服务效果。

(3) 公众参与：绿色生态理念引导与文化生活氛围营造。社区作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空间尺度，能够采取更为直接的方法促成对文化活动机制形成的引导、文化空间场景的维护与完善，让居民产生兴趣并参与其中。同时在区域、镇域公园体系的结构引导下，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等多层级公共绿色空间的场景营造，更能够为社区开展相关文化活动提供适宜的空间场所，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各项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最终实现“以文化人”的核心目的。

5 结语

在文化生态学引导下的公园城市文化保护策略, 总体可概括为: 基于文化物种的生态演绎历程, 梳理其中相关空间要素并按照文化生态学相关概念予以分类, 在不同空间尺度形成反馈路径; 基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补齐、完善、优化对应空间要素, 以此为文化物种提供适宜的存在空间与演替环境; 基于文化演替的条件与动态活性要求, 通过空间条件引导与文化活动组织, 激发公众参与与文化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由此达到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与文化资源的活态利用目的。文化生态学在公园城市文化保护中的应用, 可基于文化演绎过程以空间手段完善文化空间要素与优化文化空间格局, 映射文化内涵以强化城市文化特征; 通过文化空间氛围营造并引导文化活动的公众参与, 能够在文化保护的过程中实现其活化使用目的, 也因此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应用价值。目前而言文化生态学被较多用于历史文化村落及街区的保护研究, 较少从区域尺度探讨文化生态学在规划领域的应用, 因此通过本文希望能够在区域尺度层面对文化生态学的应用有所启发。研究目前缺少在区域尺度上的文化空间布局整体性与联系性的数据分析, 因而在文化的整体性保护上缺乏一定的支撑, 希望在以后的文化生态研究中得到完善。

参考文献

- [1] 单霁翔.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J]. 城乡建设, 2013(06): 6-11.
- [2] 王凯, 林辰辉, 吴乘月. 中国城镇化率60%后的趋势与规划选择[J]. 城市规划, 2020, 44(12): 9-17.
- [3] 陈少峰, 王帅.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建设[J]. 经济与管理战略研究, 2014(02): 171-172.
- [4]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领导小组. 公园城市: 城市建设新模式的理论探索[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 [5] 刘玉龙, 张青萍, 郑思俊, 等.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中国公园城市研究进展与展望[J]. 园林, 2021, 38(11): 70-76.
- [6] 佚名.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1(26): 17-21.
- [7] 韩炳越, 王剑, 王坤. “以文化境, 意景合一”——基于传承的城市公园设计方法探讨[J]. 中国园林, 2021, 37(S1): 167-171.
- [8] 王忠杰, 吴岩, 景泽宇. 公园化城, 场景营城——“公园城市”建设模式的新思考[J]. 中国园林, 2021, 37(S1): 7-11.
- [9] 刘华龙. 城市文化刍议[J].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 2004(04): 237-240.
- [10] 王承旭. 城市文化的空间解读[J]. 规划师, 2006(04): 69-72.
- [11] 单霁翔. 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J]. 文艺研究, 2007(05): 35-46.
- [12] 王向荣. 自然与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国土景观多样性[J]. 中国园林, 2016, 32(09): 33-42.
- [13] 王云才. 破碎化与孤岛化[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 [14] (美)朱利安·斯图尔德. 文化变迁论[M]. 谭卫华, 罗康隆,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4.
- [15] 柴毅龙. 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J].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02): 1-5.
- [16] 毛刚, 黄天其. 文化物种观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J]. 规划师, 2001(03): 90-94.
- [17] 李云燕, 赵万民, 杨光. 基于文化基因理念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方法探索——重庆寸滩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08): 83-92.
- [18] 李和平, 张邹. 文化生态视角的历史街区保护——以重庆金刚碑历史街区为例[J]. 城市建筑, 2011(08): 48-51.
- [19] 侯鑫, 王绚. 文化生态学及其在城市文化研究中的意义[C]//200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大连: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08.
- [20] 刘书安, 李凡, 杨俭波, 等.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佛山古村八景的“地域性”解读[J]. 中国园林, 2020, 36(02): 91-95.
- [21] 韩锋. 文化景观——填补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空白[J]. 中国园林, 2010, 26(09): 7-11.
- [22] 徐文廷, 林建群. 文化生态学视角的文化景观研究[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7(03): 82-88.
- [23] 张玘.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格凸河苗寨文化保护探析[J]. 城市建筑, 2020, 17(24): 63-65.